

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

王相欽

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独立主权丧失,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通商口岸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冲击,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出现了封建顽固派、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社会集团和派别。实际从事近代工商业活动和以地主、官僚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传统的经济思想观念,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害。其间,他们特别强调商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许多重商主义思想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一股重商思想的潮流,郑观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生于1842年,卒于1822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形势影响下,年轻的郑观应于1858年就放弃了一般传统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科举道路,远离家乡赴上海从商,经人介绍,担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达20年之久。1880年以后受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的委派,先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总公司和上海电报局等企业单位担任帮办、总办等高级职务。同时,又自行投资创办贸易、航运、金融、工矿等近代企业。

“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盛世危言后编》,卷八)这是郑观应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写照。他虽然长期担任外国洋行的买办和参与了洋务活动,但是并没有走上买办、洋务官僚的道路,而是在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实际活动中,深感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危害和本国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从而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倡变革,转变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和民族工商业者的重要代表。一生中先后撰写了许多有关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论著,抨击时弊,提倡维新编辑出版了《救时揭要》(1862年,后又增删为《易言》)、《盛世危言》(1892年)、《盛世危言后编》(1909年)等重要著作,以大量的篇幅论述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盛世危言》中的商战上、下篇,商务一、二、三、四、五篇,是他重商思想的集中反映。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和主张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基本核心是发展经济，富强救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主张改良变法，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改良政治，保护和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经济思想上，他特别重视商业，强调要以商业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进行商战的重要性，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郑观应充分肯定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纲领。他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通其血脉也。”（《盛世危言》商务一）并以中外国家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论述商业在一个国家致富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入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盛世危言》商战下）同时，针对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以农立国”的传统思想影响，提出了“以商立国”、“以商为本”的口号。他认为：“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古有四民，商居其末。古以农为本，盖谓国无民不足以为治，民无农不足以养也。”

“居今世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考西人之商于中国也，自明季始。中国与彼族立约通商也，自道光始。泊乎海禁大开，中外互市，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同来之盛。”

“彼方以国护商，群恃中华为外府，吾犹以今况古，不知商务之匪轻。天下滔滔，谁为补救哉？”（《盛世危言》商战上，附录）从重农到重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时至今日，中国必须改弦更张加以补救。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必须以商业为中心，士、农、工、商四业，只有以商业为依托才能得到正常发展。“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盛世危言》商务二）在肯定商在四民中的纲领地位的同时，郑观应并不否定士、农、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而是主张商“与士、农、工互相表里”要振兴商务，必须依赖士、农、工三者的发展。“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盛世危言》商战下）士和教育直接关系到商务的振兴。郑观应首先主张改变中国士的传统积习，以适应发展商务的需要。“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盛世危言》商务二）提倡培养懂得工艺制造，商业经营的人才“国家欲振新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盛世危言》商务五）农业的发展，对商务也至重要。“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盛世危言》商战上）“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兼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盛世危言》农功）工业商务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说：“尝阅西书，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盛世危言》商务五）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西人之富在工而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盛世危言》技艺附录）又说“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视工艺之巧拙

，有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往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盛世危言》商战上）由此可见，郑观应以商为本，重视商业，把商业作为掌握四民之纲领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商业为中心来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当时来说，其进步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郑观应在强调商业重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的必要性。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落后国家的时候，既使用兵战，也注重商战。“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盛世危言》商战下）所谓兵战，就是用军事侵略，依靠武力来掠夺领土和财富；商战，就是经济侵略，通过商品输出和原料收购等经济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郑观应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中，商战比兵战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他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盛世危言》商务三）商战是兵战的目的，军事侵略的最终是为了经济利益。“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设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盛世危言》商战下）并以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事实，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对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商战比兵战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气，蔽国无形。”（《盛世危言》商战上）军事武装侵略危害一个国家十分明显，而用经济通商的手段掠夺一个国家，则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人们不容易发觉和防备。“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不形，譬如油尽灯灭。”（《盛世危言后编》上戴少怀尚书书）“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盛世危言》商战下）因此，商战可以使一个国家和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亡国灭族，不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郑观应主张以“兵战”来抵御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盛世危言》商战下）“我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盛世危言》商战下）因此，他的结论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决胜于商战”。（《盛世危言》商战上）“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盛世危言》商务三）

如何振兴商务同外国进行商战呢？，郑观应针对我国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入超不断扩大的现状，认为：“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名）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因此，他主张以振兴丝、茶二业为纲目，采取十项措施。广种烟土，徐分毒饵之焰，与外国进口鸦片战；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与外国洋布战；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以及玻璃、器皿、钟表等，与外国诸用品战；发展造纸、卷烟、酿酒、制糖等业，与外国诸食物战；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香皂等物，与外国化妆品战；遍开五金、煤矿，与外国洋铁、洋铜战；广制煤油、自造火柴，与外国洋油、洋火战；

整顿磁器厂务，精工细制，与外国玩好珍奇战；以中国传统的绸缎织造之法纺织外国丝绸，运往各国，与外国零星杂货战；鼓铸金、银钱，办理一律，与外国洋钱战等等。（《盛世危言》商战上）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盛世危言商务三》）“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盛世危言》商战上，使中国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郑观应的商务和商战思想，实际上是要以商业为中心来全面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有：

建立主管全国的商业管理机构。中央政府设立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有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商务局凡有所见，咨禀于南北洋通商大臣，倘有遏抑不通，即径达商部。”“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盛世危言》商务三）

鼓励私人工商业资本发展。郑观应主张仿照日本，“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自）能百废具举。”（《盛世危言》商战上）“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盛世危言》商务二）并对他们实行宽松政策。“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利藪可兴，办有成效者，国家给以称颂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国家许其报穷免究。如此而商务不振者，未之有也。”（《盛世危言》捐纳）

革除弊端，为工商业发展扫清道路。郑观应指出：“内地商务所以不振者，其弊有三：一、厘卡日增，商贩成本加重。二、卡丁、差吏额外需索。三、商伙任意舞弊，甚至拐骗、盗劫，不得申诉严惩。欲祛三弊，必须痛除积习，妥定新章。”（《盛世危言》商务二）他要求裁撤厘金，“厘金不撤，商务难以振兴。（《盛世危言》厘揭）收回海关主权，“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后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权在上，而必大为变通也。”（《盛世危言》商务三）

倡办商学，培养实用人才。郑观应认为：“商贾之学具有渊源。”（《盛世危言》商战上）“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宏。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盛世危言》商务二）要振兴商务，必须重视研究新的商学。他指出：“中国尊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盛世危言》商务二）针对中国旧学的弊病，他提倡学习西方“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盛世危言》商战下）“宜设立商务学堂、博物馆、赛珍会，以为考究之所。”（《盛世危言》商务二）商学教育应“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盛世危言》商务三）并对“奇才异能”、“博闻强记、著书立说”者给予奖励。这样，“则商贾中人材辈出，将见国无闲人，地无弃物，自然商务振兴，而闾閻日有起色矣！”（《盛世危言》商务二）

郑观应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

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的商战思想，以辩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在发展经济搞好商战的前提下，才能搞好兵战。“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最后，“决胜于商战”。这种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的。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的观点与主张，适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不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虽然郑观应的振兴商务、富强救国的美好理想并未成为现实，而且，同历史上的其他著名思想家一样，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观点和主张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一方面，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侵略本质认识不足，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和现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并认为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大量入超是由于中国的商务不发达造成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存在幻想，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来实现自己的革新主张。郑观应曾以“道”与“器”的关系来表述新学与旧学的对立。所谓“道”就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具体的政策措施。他认为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器”，而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的“道”仍可以继续保留，并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与洋务派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基本相同的。另外，在郑观应的众多变革主张中，也有的是片面与不可取的。例如，他提出的“驰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以与外国鸦片竞争的主张，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下策，等等。郑观应的这些局限性与片面性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空想社会主义时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观点和主张也正是如此。

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伟大的中华民族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被人们理解与重视。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下决心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今天，我们研究郑观应重商思想的观点与主张，就是要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成果的同时，更好地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成果，总结中国近代商业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